

柏孜克里克第20窟供养人画像汉元素微探

刘倩倩

新疆大学历史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3年10月22日；录用日期：2023年12月6日；发布日期：2023年12月13日

摘 要

佛教在新疆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西迁后改宗佛教的高昌回鹘在柏孜克里克石窟寺留下了许多佛教艺术。这些精美的佛教壁画不仅拥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更是见证了高昌回鹘地区佛教历史。文章从柏孜克里克第20窟供养人画像入手，通过对人物衣饰分析与考证，去探寻高昌回鹘佛教对汉文化的吸收与融合，了解高昌回鹘与汉地的交流对民族文化发展的意义。

关键词

高昌回鹘，供养人画像，汉元素

A Brief Exploration of the Chinese Elements in the Portraits of the Supporters in the 20th Caves of Bezeklik

Qianqian Liu

School of History,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Oct. 22nd, 2023; accepted: Dec. 6th, 2023; published: Dec. 13th, 2023

Abstract

Buddhism has a long history in Xinjiang. Gaochang Uighur, which converted to Buddhism after moving west, left behind many Buddhist arts in the Bezeklik Grottoes Temple. These exquisite Buddhist murals not only have high artistic value, but also bear witness to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Gaochang Uighur region. Based on the paintings of the suitors in the 20th cave of Bezeklik,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bsorption and fus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Gaochang Uighur Buddhism by Gaochang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figure's clothing, to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exchanges between the Gaochang Uighur and the Han national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文章引用: 刘倩倩. 柏孜克里克第20窟供养人画像汉元素微探[J]. 国学, 2023, 11(4): 503-507.

DOI: 10.12677/cnc.2023.114077

national culture.

Keywords

Gaochang Uighur, Portrait of Provider, Chinese Elements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高昌不仅是丝绸之路重要的站点，还有着悠久的佛教历史。高昌地区的柏孜克里克石窟最迟开凿于四世纪末，后成为高昌回鹘王家寺院。作为王家寺院的柏孜克里克石窟寺见证了高昌回鹘地区佛教发展与繁荣。石窟寺内的佛教艺术是映照高昌回鹘的一面镜子，成为研究高昌地区社会状况的重要资料。

2. 高昌回鹘与第 20 窟供养人画像简述

(一) 高昌回鹘简述

回鹘，南北朝时作袁纥，隋作韦纥，唐朝作回纥，788 年以后改称回鹘，源出匈奴治下的丁零部落，历史上曾依托高车。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到七八世纪时，始以一个独立的、具有较强大军事力量的民族出现于历史舞台。该族分为内九族和外九部[1]。该族分为内九族和外九部。内九族又称“九姓回纥”，外九部又称“九姓乌古斯”。唐朝自骨力裴罗始册封历代漠北回鹘可汗，并多次派公主和亲[2]。长期的和亲对唐与回鹘文化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回鹘地区汉风盛行，汉地也盛行“回鹘衣裳回鹘马”。

漠北回鹘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后，从洛阳带几名摩尼教徒回到漠北。不久，漠北回鹘由原先的萨满教信仰改为摩尼教。现存《牟羽可汗入教记》记载了漠北回鹘可汗改宗摩尼教[3]。从现存的史料中可以发现，摩尼教僧人可以参加回鹘重大政治活动，在回鹘人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资治通鉴》中记载“(唐)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上之上元和元年：是岁，回鹘入贡，始以摩尼偕来，于中国置寺处之。其法日宴乃食，食荤而不食湏酪。回鹘信奉之，可汗或与议国事。”822 年，黠戛斯趁回鹘势力衰退之时攻打其都城。漠北回鹘自此分裂迁徙。其中一支迁至高昌定居，史称高昌回鹘。高昌回鹘在西迁之初仍然保持着漠北回鹘时期的宗教信仰。这让高昌地区的摩尼教在一段时间内尤为兴盛。有史记载，在高昌回鹘西迁之初的一段时间内，摩尼教的势力不仅在宗教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政治方面也如漠北回鹘时期一样有很大的影响力[4]。史书中记载五代至北宋初期，摩尼教僧人在高昌回鹘外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这些史料中可以发现佛教在这一期间逐渐取代摩尼教在高昌回鹘外交方面的地位。

(二) 第二十窟供养人画像简述

柏孜克里克第 20 窟虽在近代遭到劫掠，但是一些壁画的影像仍然可供研究。现在可见的柏孜克里克石窟寺第 20 窟的壁画图片大致可分为三组：供养人画像、大悲变相、佛本行经变。其中，供养人画像是出资修建第二十窟的人员，有回鹘贵族男女供养人、僧统供养人、比丘供养人。

供养人画像是出资兴建石窟供养神佛的人及其眷属的画像。第 20 窟的同一幅供养人画像中的人物在衣着方面相似度很高，是高昌回鹘时期贵族与僧侣衣着风貌的真实体现。沙武田先生指出，供养画像为真人大小，应该是写实类画像。回鹘男性供养人头戴发冠半束半披，留有耳洞，身穿红色圆领长袍，腰

间系蹀躞七事，手持花供养。从对男性供养人衣饰上花草纹的细致刻画可知画像的精致与真实性。回鹘女性供养人身着茜色翻领对襟长袍，高髻着冠，手持花供养。在回鹘男性和女性供养人画像上还有残存的回鹘文字，且只有回鹘文字。

在僧统供养人画像中，三位僧统供养人皆内着红色里衣，下着裙裳，外披紫色田相袈裟，于左肩作纽披，顶上无发，持花供养。但左边第一位僧统耳上有耳洞。僧统供养人题榜使用汉文和回鹘文书写。在比丘供养人画像中，比丘供养人画像的题榜只用梵文书写，三位比丘皆袒胸覆右地披着印度式袈裟，皆有耳洞，头上有板寸头发。

该石窟每一幅供养人画像中衣服的形制和面部妆容都具有模式化特点。陈爱峰学者曾说过，高昌回鹘佛教壁画已是一种相当成熟的艺术典范。该时期的佛教壁画的成熟之处在于它依然有了较为成熟的绘画模式，却还是在成熟的模式之下有着自由行笔。细看仔细，每幅供养人画像相差无几，但若是仔细观察人物的细节刻画，回鹘佛教艺术的细腻之处顿时凸显。回鹘男性供养人衣袍上花纹各有差异却又极为细致。女性供养人衣着和妆容一致，但是头上凤钗佩戴方式和耳饰样式却体现着人物的不同。比丘供养人的画像最为体现其细腻的地方在于面部的刻画。每位比丘在发际线、眉眼、胡须方面的绘画各有不同。僧统供养人中僧统的鼻梁、耳朵和右手的刻画各不相同。这些细节画的描写为模式化的绘画增添了新意，也在刻画人物时抓住人物最主要的特点，追求人物的神似度。除了对人物的刻画，在对绘画中藤蔓花枝纹的绘画方面，高昌回鹘佛教艺术自有发挥，避免了藤蔓纹的模式化，其绘画的藤蔓在样式方面有着限制，诚如陈爱峰先生所言，高昌回鹘佛教艺术在模式化之下对绘画的进行着自由创作，这也使高昌回鹘艺术成为佛教艺术典范的原因之一。

3. 汉传佛教影响

柏孜克里克第 20 窟的供养人中，三位僧统供养人皆外披紫色田相袈裟。袈裟保留了印度佛教最初的形制，体现了佛教的庄重与神圣[5]。“袈裟”原意为“坏色”，故颜色一般为灰黑色，如，缁、青、染。到了唐朝，佛教受到开放的社会风气影响，袈裟的颜色较前朝发生了很大改变。壁画中僧统所着紫袈裟在唐代开始出现，被皇帝赐予有地位的僧人[2]。故唐代，僧人着紫色袈裟蔚然成风。值得注意的是该石窟壁画中身着田相袈裟的不仅有都统，还有经变画中的僧人。经变画中，僧人所着袈裟颜色各不相同，却没有出现紫色的。据《五代史》卷 138 和《大宋僧史略》记载梁太祖乾化元年(公元 911 年)赐回鹘入朝僧人紫衣。可见，紫色袈裟最晚在五代时期便传入了回鹘人所居地区，而且因帝王赐予成为僧人地位的象征。由供养人画像的题榜可知，该石窟的三位僧统应是负责高昌回鹘地区的佛教事务的僧官。“僧统”一职出现在北魏时期，后逐渐发展出佛教管理制度。《大宋僧史略·僧统》记载“秦制关中，立僧正为宗首；魏尊北土，改僧统领缁徒。”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内地大族为避战乱经河西走廊辗转至高昌居住，其中有许多中原和河西的汉人。故此，汉人在高昌地区占有绝对的优势，汉文化也成为高昌地区的主流文化[6]。可见北魏时期佛教的繁荣，促进了佛教管理制度的诞生，而这一制度随着人口迁徙来到高昌地区。唐灭高昌后置西州郡，不仅创立两大都护府作为军政管理机构，还将诸多汉传佛教寺院进行统一的管理，并派僧官对当地佛教事务进行管理[7]。这对高昌地区佛教事务的进一步发展有着积极推动作用。唐朝包容的宗教政策也对高昌地区佛教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至宋代，王延德记载高昌“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居民春月多游，群聚邀乐于其间，游者马上持弓矢射诸物，谓之禳灾。有敕书楼，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诏敕，缄锁甚谨。复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拘其法，佛经所谓外道者也[8]。”可见，高昌地区佛教继承唐代，且对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在发现的回鹘佛教文献中，回鹘佛教文献共有 81 种，其中 41 种译自汉语、14 种译自藏语、3 种译自吐火罗语、9 种译自梵语、3 种被认为是回鹘人自己创作、其余的文献来源暂时无法确定

[9]。以流行的汉文《金刚经》为例,在柏孜克里克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多卷汉文金刚经写本残页。经学者考证,该遗址中诸多卷《金刚经》中,鸠摩罗什版本译经数量最多,与内地流行的《金刚经》版本相同[10]。然而,新疆早期进入的佛教都是小乘。直至公元4世纪中后期,由于一代高僧鸠摩罗什的出现,龟兹成为西域大乘佛教的中心,兴盛一时。据陈世良先生考证,鸠摩罗跋提时代,高昌佛教主要受印度佛教影响,大、小乘并行,经律论齐备。鸠摩罗跋提曾翻译过四部经典,即《四阿含暮抄》《阿含经》《阿毗昙心》《鼻奈经》,均属于小乘佛教经典,史书记载的大乘经典仅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由此说明,小乘佛教在当时似更为流行[11]。玄奘西行时,焉耆与龟兹地区的佛教皆是小乘佛教为主流。佛教在我国发展的鼎盛时期是隋唐时期。但这一时期,小乘佛教整体开始衰落,唐朝对西域汉传佛教进行系统管理并留有“赐额”与经文。至9世纪中期以后,高昌回鹘境内大乘佛教为主流。鉴于所搜集的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到,高昌地区从魏晋至唐在政治文化上一直受到内地的强大影响。受历史上人口迁徙的影响,汉传佛教在高昌回鹘佛教中占据主导地位。汉传佛教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以至于曾是佛教传入的重要驿站都受到了汉传佛教的影响。至隋唐时期,中央政府对高昌等地加强管理,其佛教主流逐渐与内地同步。而高昌回鹘佛教僧统的衣着和管理制度仅仅是佛教回流的一个外在体现。

4. 世俗生活的影响

杨春奋认为隋唐时期突厥及回鹘男子的发式继承了匈奴的辫发发式[12]。在《周书》卷五十《突厥传》和新疆发现的一突厥石人像也证明了突厥族男子实行辫发发式。而回鹘族男子发式尽管开始走向多样化,但就其总体而言,同突厥族一样是继承了匈奴的辫发。陈佳华认为“男子一般将头发梳至后脑勺打结,然后缠上一块黑布,或戴上一顶后面翘起的帽子。贵族阶级则把头发梳成辫子一直垂到上臂一半长的地方,在前额中把头发分开向两边梳,前额的流苏让其自然下垂,或向两边梳[13]。”漠北回鹘时期主要以畜牧业和商业为主[14]。在西迁之前,回鹘人基本上处于游牧生活状态。唐太宗给铁勒人的诏书中提到:“收其瀚海,尽入提封;解其辫发,并垂冠带[15]。”画像中,高昌回鹘贵族男子除了编发垂肩外,还将头发用冠束起。高昌回鹘原居北方草原。高昌回鹘贵族男性出现束发的样式应该是受内地的影响。史书对漠北回鹘女性衣饰记载较少,但笔者在《魏书·高车传》卷130《高车传》中找到关于回鹘前身高车的记载:“妇人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縈曲髮鬢而綴之,有似轩冕。”从高车至唐代中晚期,回鹘的衣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漠北回鹘时期的男子编发垂背,此风俗至高昌回鹘时期仍在延续。但是从回鹘男性供养人的画像知高昌回鹘贵族男子除了编发垂肩外,还有了束发的习俗;而回鹘女性供养人头上也佩戴凤钗。在唐代,凤凰样式的簪钗在妇女头饰样式中十分常见。在唐代章怀太子墓中出现头戴凤簪的女官形象。西安南郊惠家村唐大中二年墓出土的双凤纹银钗。从出土的唐代凤钗来看,唐钗以繁丽纤巧为主要特点[16]。回鹘女性供养人的头饰都体现了这一特点。回鹘男性所穿的窄袖紧身圆领袍是唐代圆领袍的特征[17]。公元640年,唐朝灭高昌后在此置西州都护府,实行汉族的典章礼仪制度。终唐代,官场服饰制度一直有着森严的等级。从出土的文物可知,在唐代西州时期,高昌地区实行中原王朝的礼仪制度。高昌地区服饰生活也应该是在那时受到内地的强烈影响[18]。同样,漠北回鹘时期,回鹘与内地在政治上的密切关系使汉文化漠北回鹘时期便流行于草原。史书有载“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成城,劲健无敌。及有功于唐,唐赐遗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殿以居。妇人中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虏俗亦坏[19]。”据此推断,安史之乱前,回鹘男、女装扮皆是传统的游牧民族特点;安史之乱后汉文化开始快速影响到回鹘人的日常生活。在唐朝时期,回鹘可汗至汉地,随行的回鹘人有着汉装者。从出土的漠北回鹘时期文物来看,草原上的回鹘人在与汉地交往的过程中也受到汉地衣食礼仪制度的影响[20]。汉族与回鹘文化交往并未随着漠北回鹘的分裂而结束。现存史料中对漠北回鹘分裂后,分裂的回鹘诸支仍与汉地有往来。高昌回鹘这一支最后的定居地高昌也是受汉文化为主导

的地区。可见无论是回鹘人还是高昌地区都早已接触汉文化并受到汉文化影响。

5. 结语

高昌回鹘西迁前便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西迁至高昌地区后,从壁画中的人物形象可知,高昌地区的汉文化随着回鹘人的到来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两族交往过程中,汉文化被高昌回鹘吸收后,成为高昌回鹘佛教艺术中的重要元素。值得注意的是,高昌回鹘柏孜克里克第20窟壁画并不是单独以汉元素为一幅画的主体,而是将汉元素与其他地区文化元素共存于同一幅绘画之中。高昌回鹘对不同文化元素的吸收与融合,将诸多文化元素容于回鹘艺术,创造出风格独树一帜的高昌回鹘艺术。这也正是高昌回鹘佛教艺术的独特与珍贵之处。

参考文献

- [1] 王溥. 唐会要[M]. 上海: 古籍出版社, 2006: 2068.
- [2] 刘昫, 等.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5195.
- [3] 程溯洛. 释汉文《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中有关回鹘和唐朝的关系[J].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78(2): 21.
- [4] 脱脱, 等.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 [5] 叶娇, 徐凯. 唐代僧衣称名考察[J]. 台州学院学报, 2022, 44(5): 12-18.
- [6] 魏收. 《魏书》卷101《高昌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243-2245.
- [7] 荣新江. 唐代西域的汉化佛寺系统[M]//新疆龟兹学会. 《龟兹文化研究》(第一辑). 香港: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2005: 130-137.
- [8] 脱脱, 等. 《宋史》卷490《高昌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4109-14114.
- [9] 牛汝极. 回鹘佛教文献[M]. 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出版社, 2000.
- [10] 彭杰.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文书相关问题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兰州: 兰州大学, 2016: 68-71.
- [11] 陈世良. 从车师佛教到高昌佛教[M]//敦煌吐鲁番学新疆研究所. 吐鲁番学研究专辑. 敦煌: 敦煌吐鲁番学新疆研究资料中心, 1990: 144-146.
- [12] 杨春奋. 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男子发式微探[J]. 鸡西大学学报, 2011, 11(7): 138-140.
- [13] 陈佳华, 等. 《宋辽金时期民族史》, 卷五, 《中国历代民族史》[M]. 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267.
- [14] 张转玲. 唐代回鹘的政治经济及风俗习惯[J]. 陕西工商学院学报, 1994(3): 78-80.
- [15] 刘昫, 等. 《旧唐书》卷199下, 《铁勒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5348.
- [16] 纳春英. 唐代服饰时尚[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107.
- [17] 王雪莉. 宋代服饰制度研究[M].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07: 106.
- [1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古代西域服饰撷萃[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0: 85.
- [19] 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266)[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8.
- [20] 吴飞.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1.